

再探传统东亚秩序的衰败问题*

陈康令

[内容摘要] 在近代东西方国际秩序碰撞的过程中,中国与西方主要势力在主权原则、工业革命、殖民主义等问题上产生了概念分歧、思维区别和意象差距,并进一步导致传统东亚秩序之中“理”的“失范”、“利”的“失好”和“力”的“失威”。从内因看,中国及诸多东亚国家未能及时顺应世界大势、未能充分实现发展进步,使得传统东亚天下秩序在与西方列强组成的新兴西欧国际秩序的复杂斗争中从“守势”走向了“失势”。从外因看,尽管近代西方世界内部呈现出较大程度的繁荣稳定,但这却是建立在将广大非西方世界变成充满血与火的“斗兽场”的基础之上,殖民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几乎无孔不入。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建设的过程中,我们要突破“维也纳束身衣”的思想枷锁,在全新的数字时代更好引领全球治理。

[关键词] 势 传统东亚秩序 概念分歧 思维区别 意象差距

[作者简介] 陈康令,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715(2024)05-0097-19

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习惯将国际体系理解为西方文明孕育产生的民族国家体系。但这却忽视了人类历史上的文明多样性和国家差异性,导致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框架中缺少非西方世界的应有位置。^① 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优势和潜力在于可以从中华文明的历史富矿中寻找更多新视角和新方法来更深入探索传统东亚秩序颇具特色的互动现象和运行机制。比如在理论创新上,通过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近代东西方国际秩序碰撞研究”(项目编号:19CGJ034)的阶段性成果。

① 王健:《综合与交叉:国际关系学与区域国别学的区分与链接》,《国际关系研究》2023年第6期,第10页。

与现有的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研究体系有机连接,^①实现外交、文明、话语的跨领域研究,更好地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主观与客观相结合。再比如“4Li 稳定模型”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传统东亚秩序在礼治框架下的运行逻辑——通过古代中国的持续推动,东亚各主要政权之间在“理”(天下礼的基本原则)、“利”(礼仪化的国际制度)和“力”(权力资源运用的礼仪逻辑)等方面往往能实现辩证统一和动态平衡。^②

在近代东西方国际关系行为体交往的过程中,新兴西欧国际秩序和传统东亚天下秩序向彼此展现了各自的特色,这些特征是以深刻的历史演变背景和文化发展脉络为支撑。随着西方势力进一步壮大和扩张,欧洲主要国际关系行为体对东方世界的“礼”“理”“利”“力”等诸多要素都发起了挑战和攻击,理想主义和保守主义色彩过于浓厚的中国等东亚国家逐渐处在了“守势”乃至“失势”的弱势位置。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后,传统东亚天下秩序逐步在猛烈碰撞中被新兴西欧国际秩序所吞噬。

一、主权原则的概念分歧与传统东亚秩序之“理”的“失范”

17世纪中叶,《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从法律上确立了国家的主权身份和在国际关系中独立对外交往的平等权,从而开创了以主权国家为基本行为体的近现代国际关系体系。源于欧洲的主权原则后来逐步扩展到世界各地,并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实践,被普遍尊奉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奠基石。^③但这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事实上,无论是对主权概念进行理想化的规划,还是对主权概念进行现实中的践行,近代欧洲各国都经过了不少摸索和尝试。

一方面,在西方世界内部,欧洲人较晚才真正将国家之间主权平等和互通外

① 潘忠岐、信岩呈:《21世纪以来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研究——潘忠岐教授访谈》,《国际政治研究》2024年第1期,第136~160页。

② 陈康令:《试论传统东亚秩序的礼治:一种分析框架》,《当代亚太》2015年第2期,第59~60页。

③ 蒋昌建、潘忠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扬弃》,《浙江学刊》2017年第4期,第12页。

交的观念设想转化为普遍实践。严格意义上说,要到18世纪末英国使节马戛尔尼访华时才形成风气,而且当时也尚未完全成形——1796年(清嘉庆元年),与马戛尔尼同属“文学俱乐部”的思想家柏克对此展开论述,成为英国首个用“外交”(diplomacy)这一词汇来指谓“管理或处理国际关系”事宜之人。^①另一方面,提出主权概念的欧洲人在近代往往对非西方世界剥夺主权。尽管主要基督教国家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主权平等,但它们对域外世界却不肯也不愿承认他国主权,建立了一种西方世界在合法性上高于非西方世界的全球性不平等体系。

在近代欧洲的政治理论和外交实践中,相互尊重主权要通过庄严隆重的典礼仪式来确认及达成,^②而不是仅仅通过签署法律文件来使之生效。这背后是旧的宫廷等级制度体系的长期延续,“朕即国家”的逻辑依然将主权和王权捆绑在一起。换言之,国与国之间的平等是要通过自身争取才能获得,而不是上天授予或者自然赋予的。对于近代欧洲各国的统治者而言,彼此之间的权力对比关系经常发生变化,施行外交典礼就成了君主展示权力乃至建构权力的重要舞台。如果外交使节能在涉外礼宾当中为本国争取到“礼仪对等”的位势,那便能相应取得“主权平等”的成果。例如,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哈布斯堡王朝曾拒绝授予英国国王“陛下”的称号。于是,当时的英国就很难派遣大使到维也纳开展有效的外交。从这个角度看,1793年(清乾隆五十八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对在华“礼仪之争”的耿耿于怀就不足为怪了。^③

相比之下,古代东亚地区的国际行为体虽然没有率先和明确提出现代主权概念,却是在实际行动中行使某种意义上的主权。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主权想象”,^④需要从天下秩序的主观性和客观性的双重维度加以考量。^⑤从权力对比的角度看,传统东亚天下秩序和古代中外关系的特征可以被称为“非对

① Harold Nicolson, *Diploma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 11 ~ 12.

② 罗志田:《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研究〈怀柔远人〉的史学启示》,《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第108~109页。

③ 参见Henrietta Harrison, *The Perils of Interpreting: The Extraordinary Lives of Two Translators between Qing China and the British Empi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1。

④ 参见[美]何伟亚著,邓常春译,刘明校:《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⑤ 李扬帆:《“中华帝国”的概念及其世界秩序:被误读的天下秩序》,《国际政治研究》2015年第5期,第28~48页。

称”或者“不均衡”——秦朝完成大一统后,中国在与周边政权形成的国际关系中长期处于中心地位,在维系地区稳定与和平的过程中常常发挥主导作用。尽管各国大小强弱并不一样,中国实际上与周边政权一同享有平等交往的权利,特别是中国的克己复礼、不以大欺小、以身作则并且推己及人等都起到了良好的“示范”效果。

有学者认为,在传统东亚天下秩序的“正式等级制”结构中普遍存在着“非正式平等”的国家间互动。^①《孝经》有云:“礼者,敬而已矣。”《史记·乐书》记载:“礼主其谦……礼谦而进,以进为文。”在中国的引导下,古代东亚的多数国际关系行为体是通过施行适度的“敬”与“让”建立友好关系。尤其是在遇到特别棘手的国际问题时,需要各国在互相尊重和互不侵犯的基础上做出一定的让步,由此便能产生和实现长期信任和跨领域互惠。无论是“礼治下的和平”(1759年至1840年),还是以册封礼制普遍化和贡赐礼制频繁化等为代表的体制机制建设,都是东亚秩序的重要基础。这与近现代无政府状态下西方主导的“多极均势”和“霸权稳定”等情势非常不同。

那么,为何近代西方世界提倡的明确的主权观念未能很快在东方世界生根发芽?从“概念分歧”的角度可以探得一些原因。由于历史文化等背景的差异,世界各国在交往互动中往往会对某些特定概念具有不太一致的认知和理解。也就是说,虽然各国有时援引的是相同的政治概念,大家对其基本含义也没有异议,但使用时却会产生不同的侧重。^②分析主权概念分歧需要进行属性上的细分——从根本性质看,可以区分为实质主权与名义主权;从覆盖范围看,可以区分为全面主权与部分主权;从原则立场与政策方向的关系看,可以区分为绝对主权与相对主权。在近代东西方国际秩序碰撞的过程中,面对西方极具进攻性和侵略性的军事威胁和外交压力,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所要坚持的主权,其实是重“实”甚于重“名”。

^① David C. Kang, *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 Five Centuries of Trade and Tribu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54.

^② Pan Zhongqi, “Managing the Conceptual Gap on Sovereignty in China-EU Relations,” *Asia Europe Journal*, Vol. 8, No. 2, 2010, pp. 227 ~ 228.

比如,在面对西方殖民势力的侵袭时,明清中国有不少保护自身国家利益的行为,但在后世却饱受诟病,常被斥为“落后”和“野蛮”等。事实上,明廷和清廷对中西交流采取的是“自主限关”而非所谓“闭关锁国”对外政策,具有维护国家主权、防范西方殖民侵略的意图,无论是形成还是发展,都有其历史合理性。^①从明朝的对外开放政策看,“海禁诏令”主要是为应对海外势力的军事进攻或袭扰而颁布,是军事性的临时措施;而创设包含关“禁”和海“禁”的海关管理制度等管理措施,其实是对全球性海洋贸易的积极顺应。^②从清朝的对外开放政策看,鸦片战争的直接原因是英国难以忍受对华贸易赤字,而不是什么清朝的“闭关锁国”破坏了自由贸易规则。据统计,英国在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至1833年(道光十三年)间的对华合法贸易中始终保持逆差,并且逆差水平逐年递增,从起初的145万两白银大幅增加至后来的1728.5万两白银。^③

再比如,鸦片战争之后,“朝贡”与“条约”之争成为东西方国际秩序碰撞的焦点。西方列强试图让东亚各国摆脱对中国的朝贡关系而获得所谓“自主”的权利,但最后的结果却是这些国家大多失去了主权并沦为了西方的殖民地。作为东南亚唯一保持相对独立地位的泰国,亦是陷入了不平等条约的泥淖。1852年(清咸丰二年),暹罗贡使赴京朝贡,使团请封后在回粤途中遭土匪劫掠一空,后来在辗转返国途中道经香港。英国驻香港总督鲍林劝贡使乘机脱离中暹宗藩关系,理由是“暹罗已日渐强盛,与英法美并驾,殊无进贡中国之必要”。可是,三年后,鲍林率炮舰闯进暹罗湾,并沿湄南河溯江北上曼谷,强迫暹罗签订不平等的《暹英条约》,暹罗从此丧失治外法权与关税自主权。国门既已洞开,列强蜂拥而至,暹罗相继与美、法等十多个国家签下了不平等条约。^④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由于长期扮演中央政权的角色,清朝中国在传统东亚

① 中国历史研究院课题组:《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历史研究》2022年第3期,第16~17页。

② 王栋、徐祥民:《明代海禁律令体系的法律性质澄清——兼驳明代闭关锁国论》,《南大法学》2024年第1期,第116~128页。

③ 周文、冯文韬:《贸易顺差、闭关锁国与西方话语批判——基于鸦片战争的经济学再审视》,《上海经济研究》2023年第2期,第26~27页。

④ 张启雄:《东西国际秩序原理的冲突——清末民初中暹建交的名分交涉》,《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第94~95页。

秩序内部是抗拒推行近代新兴的主权原则的。清政府并没能成功迈出“名实相符”、言行一致的关键一步,而是更倾向在政治和外交上对主权原则进行模糊处理。在同俄国和英国打交道的过程中,清廷其实已经较为了解甚至适应了近代西方主流的主权观,但却非常缺乏对自身所在的天下秩序进行自主改造甚至自我革命的决心。在各种因素的限制下,西方殖民者持续不断地对不少东南亚国家破坏主权的行径也没有得到中国的充分重视和及时反应,这直接导致了传统东亚秩序的理念“失范”。等到中国自己沦为半殖民地时,终于尝到了在历史惯性和未来大势面前左右为难的苦果,才真切感受到实际拥有的主权已经开始逐步沦丧的巨大危害。

二、工业革命的思维区别与传统东亚秩序之“利”的“失好”

国际关系中的国家例外论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以本国更卓越为立论基础,使一国倾向实行扩张型的外交政策,旨在向世界其他国家推广本国的理念和规范;二是以本国更独特为立论基础,使一国倾向实行防守型的外交政策,强调国际上通行的理念和规范不适用于本国。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可能会呈现出两种不同例外论的倾向。究竟更倾向于哪种例外论,具体取决于一国的实力状况和国际地位,以及一国人民的主流思维方式。

近代以来西方大国的例外论更偏向“卓越论”。例如崛起后的英国和大革命时期的法国都提出过自己的例外论,阐述自己是崭新国际政治的旗手和人类发展进步的先驱,是其他国家效仿的榜样;再比如美国从建国伊始至今都坚信自己所在是“应许之地”,自己所建乃“山巅之城”。^①而东方国家的例外论更偏向“独特论”。^②古代中国曾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东亚秩序中的核心国家,拥有比周边政权更优越的实力和文化,但中国更讲究“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并不热衷于主动

^① Walter A. McDougall, *The Promised Land, Crusader State: The American Encounter with the World since 1776*,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97, p. 17.

^② 潘忠岐:《例外论与中美战略思维的差异性》,《美国研究》2017年第2期,第9~27页。

向外灌输自身的理念或要求别人照搬自己的行为模式。

在传统东亚秩序中,中央政权对礼治之利的“示好”主要是指大国和小国之间、主国和宾国之间的“礼尚往来”,或者说互惠的利益交换。对于中国来说,主要的国家利益包括稳固天下正统、确保边境安宁、维系整个东亚秩序的稳定和平;对于周边政权来说,主要的国家利益就是自身国际合法性能得到中国承认和他国尊重,以及获得实际的经济收益。贡赐并不是经济剥削,而是政权之间维系良好关系的一种政治经济手段。正所谓“礼轻情义重”,只有共同实现长期利益和复合利益,才能保持和提升各类国际关系行为体对天下秩序的满意度。同时,各方也应在适当时候做出一定的妥协和让步,即具备“以退为进”的礼让精神。对于中国来说,要满足周边国家的利益就需要提供不少回赐,让周边政权真真切切得到实惠;对于周边政权来说,要满足中国的利益就需要顺应中国的主导作用。

在近代东亚各政权与西方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接触的过程中,大家都认识到了彼此之间存在差异。在当时东亚经济发展水平要好于西欧的情况下,西方世界的“卓越论”似乎并没有多大说服力去战胜东方世界的“独特论”。据有关测算,从1700年到1820年这120年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3.1%提高到了32.4%,年增长率为0.85%;而整个欧洲的这一占比则是从23.3%仅仅提升至26.6%,年增长率为0.21%。^①也就是说,一直到鸦片战争前,中国市场在绝对规模和增长速度上都大大超过欧洲市场。尽管受到了西方殖民的负面影响,以中国为中心的传统东亚秩序中的国际贸易依旧保持着繁荣。

在国内外市场中都处在核心位置的是中国的江南地区。这里不仅是东亚地区高附加值轻工业产品的生产中心,也引领着东亚地区的劳动分工与专业化发展。对这样一个经济加速成长的时期,似乎很容易作出预测,如果没有西方入侵,包括江南经济在内的中国经济和东亚经济都会继续沿着既定方向发展下去。

^① Angus Maddison, *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Paris: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1998, pp. 25 ~ 40.

当然,人们也很难相信清廷会有充分的理由去突然改变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且去学习和接受一个遥远而又陌生的西方世界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既是源于传统东亚天下秩序自身演进的历史惯性,也是因为新兴西欧国际秩序的影响力不够。

对于近代以来东西方之间的“大分流”或者“差距”是在何时以及在什么程度上发生,目前学术界的争议还很大。基本上已经形成共识的是,一直到1800年左右,世界各地的平均经济生产率、产出、人均收入大体上是相同的。^①在漫长的农业时代,东方世界的主要国家普遍比西方世界的主要国家拥有更广的疆域和更多的人口,这往往是创造大量财富的直接有利条件。随着欧洲各国率先进入工业时代和转变到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形态,西方世界生产力得到充分发挥并推动了生产关系变革,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大幕逐步拉开。

后来的历史进程证明,正是由于对西方世界方兴未艾的工业革命的冷眼旁观乃至狠心排斥,最终受到伤害的只能是东方世界自己。人类社会的进步并不会因为东亚世界早早达到了农业文明的巅峰而“历史终结”,奋起直追的西欧世界所坚持的工业文明新形态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工业革命是近代工业化的实际开端,也是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过渡的转折点。在大规模和高强度的经济组织变革、技术变革和工业结构变革的过程中,相关国家的人口、经济总产值和人均产量等都会走向可预期的持续增长。从世界经济的演进规律看,以英国的自主经验为基础的近代工业化模式,正是马克思再生产理论所揭示出来的那些普遍规律的具体体现。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得出的人类普遍规律。然而至今为止,人们对于工业革命产生原因的共识依然没有形成。有许多学者甚至将英国的工业革命发生的原因简单溯源为政治革新,这是典型的本末倒置。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是生产力的变革推动了生产关系的变革。实际上,近代英国的独特成就在于能够整合自己的几乎所有优势和集各种创新于一身,与时俱进

^① [德]贡德·弗兰克著,[美]罗伯特·A·德内马克编,吴延民译:《19世纪大转型》,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第4~10页。

地将产煤、炼铁、技术革新、海外殖民、资产阶级革命各类因素有机地融合到一起,才率先创造出当时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迈入工业文明的奇迹。

那么,我们不禁还要问,如果当时不向西方学习,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仅仅依靠自身这种由市场扩大来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会不会自发地导致工业革命出现?与英国形成鲜明对照,明清江南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超轻结构”,即重工业畸轻而轻工业畸重。尽管江南的经济总产量和劳动生产率都在提高(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历史文化中强大的组织能力驱动的),但由于没有更大的技术突破,这里的经济成长主要还是取决于市场规模及其扩大的情况,或者说市场的容量决定了经济发展的极限。^①由于传统东亚秩序本身具有鲜明的内敛特征,以及作为东亚经济发动机的中央政权鲜有对外长期开展大规模海外贸易的动机,进一步拓宽国际市场的可能性便小之又小了。

此外,西方列强不断挤压东亚各国的发展空间,最终结果并不是让中国与周边国家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而是通过压榨他国扩大了自身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成果。就如同近代国际法成为了欧洲殖民扩张的法律武器一样,近代西方经济学尽管是研究如何有效配置稀缺资源以实现利益最优化的学问,但服务的宗旨只是西方自己实现排他性的经济增长。但不论如何,根本教训还是“早熟”的中国未能自发地展开工业革命,并且在面对银贵钱贱的货币危机等诸多挑战时束手无策,^②导致了礼治之利丧失了转型升级的宝贵机会,最终只能走向东亚秩序系统性的“失好”。

三、殖民主义的意象差距与传统东亚秩序之“力”的“失威”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论是面对怎么样的海上安全威胁,中央政权都能较好地维系传统东亚秩序内的稳定与和平大局,这背后是厚实经济实力、领先的航海技术、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完备的国防理论作为有力依托和坚强支撑。那么,为

^① 李伯重:《英国模式、江南道路与资本主义萌芽》,《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第121~122页。

^② 谢杭生:《鸦片战争前银钱比价的波动及其原因》,《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2期,第114~115页。

何在与近代西方秩序发生冲撞的时候,中国未能对来自海上的域外西方势力进行应有的“示威”?根据相关学者看法,元明以后“东海”渐渐取代“西域”成为中外更重要的交流空间。^①无论是从维系传统东亚秩序独立自主性的角度,还是从古代中国陆海复合型对外关系的护卫经验来看,海上都不应该是被忽略的一面。我们或许可以从意象差距的维度来进行解释。

国家行为体与国际秩序之间的互动是通过国家对国际秩序的“意象”(也就是相关的认知、评判、理念和构想)这个中间环节进行的。意象是矛盾的统一体,包含两种情况:一种是反映国际秩序实然状态的现实意象,另一种是反映国际秩序应然状态的理想意象。这二者之间的不一致,我们称之为“意象差距”。国家对国际秩序的基本意象和意象差距既体现了国家与国际秩序的基本关系,又决定了国家对国际秩序的满意程度和基本态度,在短时间内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在长时间内必然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同一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或者不同国家在同一历史时期,往往对国际秩序具有不同的意象和意象差距。也正是意象差距的存在和变动,国际秩序才有了生命力和新旧之分。

通过认识意象差距的变动趋势,我们可以判断一国对国际秩序持何种态度,也可以把握该国与国际秩序的关系:如果国家的意象差距呈扩大化趋势,就说明该国倾向于从根本上颠覆和变革现行国际秩序的基本结构与规范。这类国家通常被称作“修正国”,或者“非现状国”和“挑战国”。如果一个国家的意象差距呈缩小化趋势,则说明该国倾向于维护和延续现行世界秩序的基本结构与规范。这类国家通常被称作“现状国”。从国家对国际秩序的参与、受益、影响三方面来看,如果一国对国际秩序的意向差距呈扩大化趋势,则可能采取以下态度和行动:参与方面,倾向于以军事参与为主,即强调优先选择通过武力手段解决国际冲突、进行国际干涉,而非通过外交手段协调国际矛盾、融入国际制度的外交参与;受益方面,只关注物质性成长(国家实力的提升)而不在于社会性成长(国家的社会化,即对国际规范的接受和内化);影响方面,在器物层面上对国际体系的

^① 葛兆光:《从“西域”到“东海”——一个新历史世界的形成、方法及问题》,《文史哲》2010年第1期,第18~25页。

塑造和在观念层面上对国际规范的建构都与现行国际秩序的基本结构和规范相背离,或者一国不能够在现行国际秩序基本结构和规范的框架下发挥较大的于己有利的积极影响。^①

大航海时代开始后,“走出中世纪”的西方主要国际关系行为体放眼域外,已不再满足于在欧洲范围的你争我夺。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后,以基督教文明为底色的西方国际关系行为体开始摩拳擦掌,不再拘泥于身处亚欧大陆的最西端。欧洲教权、王权、商权实力的远征目标就是更广泛的全球其他地区,包括遥远的东方世界。由此形成的新兴西欧国际秩序便具有“两面性”,不仅包含欧洲的部分,也包含海外的部分,这种崭新的国际秩序样式与当时其他地区的国际秩序迥然不同。根据大量商人、传教士、旅行者等源源不断地反馈到欧洲的信息,东方世界的许多迥异特征逐步为西方世界所熟悉。西方国际关系行为体对东亚异质的传统东亚天下秩序的意象差距也随之增大起来。

当我们把视野聚焦在亚欧大陆的最东方可以看到:相对而言,东亚各国是这里原本的陆上定居者,而远道而来的欧洲侵略势力就是飘忽不定的海上游牧者,新的地缘矛盾在双方的接触中不断产生和扩大。按照东亚秩序的规矩,主国和宾国之间应当以礼相待、薄来厚往,但大老远跑来的西方势力并不仅仅是来“做客”的,而是想要“反客为主”甚至“喧宾夺主”。此时的欧洲人已经在美洲大陆等“新世界”的殖民征服中尝到了甜头,肆无忌惮、横行无阻,故而非常不习惯和不适应在东亚还得重新接受教化、彬彬有礼、循规蹈矩,更别说有时还会遇到各种抵抗或者不得不“屈服”于独立、自主、强大的本土力量,这与想象中可以轻松获得的逆来顺受差距甚大。

将纵向时间维度和横向空间维度结合起来分析鸦片战争前西方国家对传统东亚秩序的态度,我们可以发现:在参与方面,西方势力更偏向用武力威慑或者攻击来冲击传统东亚秩序,只会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采取外交选项;在受益方面,西方势力只希望在东亚获得大量财富等物质收获,而对参与传统东亚秩序的

^① 潘忠岐:《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参与、受益和影响——基于意象差距的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3期,第48~54页。

社会化不感兴趣;在影响方面,西方势力坚持使用近代国际法的海外殖民版本作为自己在域外世界活动的行为准则,而与传统东亚秩序中的天下礼治处处作对。

也就是说,近代西方国际关系行为体对传统东亚天下秩序的意象差距是呈不断扩大化的趋势。西欧秩序中的各国在自己的体系中是“现状国”,但到了东方则变成了对天下秩序的“修正国”、“非现状国”或“挑战国”。他们的种种行为取向就是致力于彻底颠覆当时在东亚尚且运行良好的天下秩序的基本结构与规范。可惜甚至可悲的是,东亚中央政权和周边政权都没有及时和充分意识到问题的严峻性。在近代的全球各个大陆中,之所以亚洲受到西方殖民主义的影响最小,并不是因为欧洲殖民者有多仁慈,主要还是因为中国等主要行为体一度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强大到足以避免直接或间接被征服。^①然而,意象差距的存在意味着,西方列强对东亚秩序极度不满,只要有可乘之机,就会拼尽全力地绞死中国这个庞然大物。

到了19世纪,不仅东亚诸多行为主体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来自海上的西方殖民力量的强劲威胁,自成体系但较为内敛的传统东亚秩序也遭受着西方秩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各个击破”和“全面渗透”。过去人们普遍认为,清朝在鸦片战争中败下阵来,是社会生产力落后、武器装备陈旧、封建政治腐败、军事指挥不灵等种种原因共同造成的。^②其实,因晚清塞防和海防之争引发人们高度重视的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早已客观发生。但中央政权一直到鸦片战争之后才开始主观理解这种从未遇到过的海上威胁取代陆上威胁的情况。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中央政权的国防失守和传统东亚秩序礼治之力的“失威”。元朝建立后,特别是清朝统一中国后,随着中枢区域和泛游牧区域的高度融合,东亚世界的陆上整体和平态势显著提升,海上也没有强有力的秩序挑战者,出现了1759年至1840年间的“礼治下的和平”。因此,作为传统东亚秩序的安全主导力量,中央政权对军事威胁的敏感度下降了许多,礼治之力示威

①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董书慧、王昶译,梁赤民审校:《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7版修订版)(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64页。

② 黄顺力:《鸦片战争时期传统海防观的影响与扬弃》,《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第53页。

方式的使用情况也相应减少很多。权力资源运用的礼仪逻辑被深度限制,表现就是“失礼入刑”的原则没有得到充分落实。可与此同时,欧洲列强越来越习惯于使用坚船利炮作为攻击其他类型国际秩序的高效武器,并且灵活使用近代国际法的种种修正版本为自身的殖民行为提供合理依据。

四、在失败中吸取教训:突破“维也纳束身衣”的思想枷锁

在西欧秩序诸多行为体的猛烈撞击下,清朝中国对当时天下大势和自身相对情势的判断、运用和把握都不理想。近代西方国际秩序的冲击之所以造成“礼和天下”式的传统东亚秩序走向衰败,很大原因是中国与西方主要势力对主权原则、工业革命、殖民主义等问题的认知上产生了重大的概念分歧、思维区别和意象差距。对此,中国未能在理念和实践上进行及时、恰当、积极、有效的回应,从而导致了体系秩序层面和行为体层面发生了“理”的“失范”、“利”的“失好”和“力”的“失威”。

为何在全球化早期会出现西方世界逐步兴起与东方世界渐渐颓败这样的鲜明对照?不少人往往习惯认为是当时西方世界在理念、利益和力量上都战胜了东方。也有学者倾向于认为是日本试图取代中国的野心造成了东方秩序的“自我解体”。^① 本文则倾向于认为,传统东亚天下秩序之所以在近代不幸惨败,要将外部和内部因素结合起来辩证考量。近代中外关系错综复杂,是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建设过程中亟需妥善对待的重要研究议题,我们要坚持反帝和反封建齐头并进,决不能丧失文化主体性和文明的主体性。

一方面,就外因而言,近代欧洲主要国家借助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而实力大增,由此获得了自身发展的上升之势,但西方列强选择了持续进行全球扩张并且不断向非西方世界施加“攻势”以强化“得势”。

正是在维也纳秩序下,西方主要国家完成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经济蓬勃发

^① 韩东育:《“华夷秩序”的东亚构架与自解体内情》,《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50~53页。

展,欧美世界内部在一定程度上逐渐呈现出繁荣稳定景象。但列强们却将全球其他地区变成了充满血与火的“斗兽场”,争先恐后地向欧洲之外发起了大规模的疯狂扩张和残酷的殖民统治,对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世界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非西方世界的政治体制、思想文化、生活方式等各方面遭受的冲击接踵而至,^①这严重损害甚至击溃了世界各国在政治安全上的独立自主和社会文化上的多样传承,更是在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了吸血式的“中心—边缘”依附型经济结构。^②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③与之相似甚至更为严重的情况在东方各国比比皆是。

世界进步之势是决定国际进程的重要因素,也是判断国际秩序演进方向和程度的重要指标。近代率先实现各类革命的西方列强并不愿将自身的进步转化为全球各国的共同进步,而是选择了“非此即彼”式的“我赢你输”。为获取更多更廉价的原材料,并让资本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率,西方列强纷纷推行殖民主义乃至帝国主义政策,施行极具破坏性和非正义性的对外攻势。^④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扩张和殖民地瓜分随之成为西方国际政治中不可阻挡的“前进”大势。然而,殖民化进程却让亚非拉的很多处于守势的国家和民族愈发陷入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困顿境地,大多数处于全球南方的发展中国家因此依附于北方发达国家,被迫进一步强化了自身的弱势地位。^⑤

另一方面,就内因而言,清朝中国主导维系传统东亚秩序稳定和平的力量严重缺失,尤其是科技实力和军事实力明显未能跟上西方列强迅速增长的步伐,直接导致了东亚各国从“守势”走向了“失势”。

从近代的国家之势与世界之势相互影响作用的角度看,新兴西欧国际秩序

① 李学智:《冲击—回应模式与中国中心观——关于〈在中国发现历史〉的若干问题》,《史学月刊》2010年第7期,第93页。

② 参见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Vol. 1: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ew York and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74。

③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7月1日)》,《求是》2021年第14期,第5页。

④ 参见[苏]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⑤ 潘忠岐:《“势”及其对于理解国际政治和中国外交的独特价值》,《国际观察》2020年第1期,第91页。

一方面引领了人类近代诸多具有进步意义的突破性创新和革命性事件,另一方面则对当时非西方世界已经存在的各类国际秩序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猛烈冲击。从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到维也纳秩序,近代西方国际关系主体中的教权、王权、商权势力此起彼伏、你争我夺,它们对包括东方世界的攻击有时候是集中的、有时候却是分散的,有时候是针对周边政权、有时候则是针对中央政权,有时候是以国家行为体的方式交往、有时候又是以非国家行为体的方式交往。

但传统东亚天下秩序行为主体并未及时认识到这两种客观存在的大势变化。在方兴未艾的全球化大势和现代化大势面前,清朝中国主导的传统东亚秩序未能顺势而上、乘势而为地取得发展进步。再加之传统东亚秩序的主导权过度集中在中国手中,而当时清廷未能深刻理解西方秩序极为复杂的构成和十分多样的侵袭特性。正所谓“双拳难敌四手”,尽管清朝和周边各国采取了一定的自主应对措施,但却在发展的道路上“原地踏步”,甚至还相对于西方世界发生了“退步”,因而在历史关头的关键抉择中发生了严重错误,造成了非常被动的应对局面和极为惨痛的历史教训。

进一步看,我们在很长时间里又何尝不是被套上了一种“维也纳束身衣”式的思想枷锁?这是对“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的加强和扭曲,是“西方中心论”在国际关系学界的具体呈现。^①正是在各种各样的认知束缚下,日积月累的观念上的误区层出不穷:你追我赶的良性竞争被束之高阁,你死我活的恶性循环被推波助澜,不平等条约成为了正常现象,“落后就要挨打”成为了普遍规律,全球化和现代化成为了西方独享的胜利果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以“闭关锁国论”和“冲击—反应论”为代表的各类西方中心式的话语就是掩饰“维也纳束身衣”的修辞手段。这些看似理性的学说实则充满意识形态偏见,主要是把传统东亚天下秩序中央政权的中国当作一个批判的“靶子”来展开所谓“客观”观察和“理性”论述,其辐射范围则是广大的非西方世界。

如今,“闭关锁国”这类思维定势的缺陷愈发明显。不论是从近代国际法诞

^① 李兴:《世界史“西方中心论”破解与“三大体系”构建初探》,《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第123~128页。

生的初衷出发,还是站在今天的角度看,是否开放、如何开放、开放范围多大等都属于国家主权范围,任何国家都有权决定自己对外开放的程度。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世界从未对西方世界关上大门,用“闭关”加以概括不符合历史实际,而应用“限关”来代替。“闭关锁国论”的政治危害和思想伤害在于:是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蛮横地撞开东方国家的大门,并将其物质产品和社会规则强加于人,可施害者却还要从被害者身上给自己的恶劣行径寻找到足够的辩解。所以说,这是一种典型的“恶人先告状”式的话语陷阱。

同时,“冲击—反应论”之类的说法正面临越来越多的尖锐批评,解释力不足的背后是欠缺纵向的历史深度。其核心观点是:古代中国社会曾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缺乏冲破传统框架的内生动力。在19世纪中叶经过西方的冲击之后,老迈的中国才得以向现代社会演变。该研究范式起源于美国,传到中国后曾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比如挑战了曾一段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教条主义历史观,有助于中国近代史研究回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①但此后这种观点被盲目信奉甚至崇拜,许多人的趋之若鹜使之成为了又一种新的思想教条。费正清则在提出此论20多年后的著作再版序言中强调——“西方冲击”仅仅是中国多样图景中的元素之一。要解读中国对西方的回应必须将它放在中国的总体历史中考察。^②

综合而言,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东西方文明互动史中的关键分水岭,全球“东降西升”的大势从此开始加速。如果用两条曲线来指代近代东西方世界的发展趋势,那么东方世界就是从顶峰持续向下走低的一条线,西方世界就是不断向上爬升的一条线。问题在于,当时东方世界逐步衰落前的起点是高于西方世界,还是低于西方世界,抑或和西方世界持平?当时东方世界的没落与西方世界的兴起相比,是更早,还是更晚,抑或同时?近代东西方世界究竟是平行发展于不存在交集的两个空间,还是在各式各样的交往互动中进行大量的彼此竞争和相互学习?“维也纳束身衣”的判断是:东方世界是“弱者更弱”而不是“强者变

① 张艳国、刘劲松:《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西方话语体系及其误区》,《学术研究》2013年第12期,第112页。

② [美]费正清、邓嗣禹著,陈少卿译:《冲击与回应:从历史文献看近代中国》,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版,1979年版前言。

弱”。无论是“闭关锁国论”还是“冲击—反应论”都试图去“坐实”近代东方世界的衰败是命中注定、大势所趋、咎由自取。我们应该努力打破这种理论上的“紧箍咒”，用平视的视角来还原近代东西方国际秩序碰撞的立体图景。

在现有研究以“自主限关”的全球化新话语取代“闭关锁国”的全球化旧话语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尝试用“序势进步”式的现代化新话语代替“冲击反应”式的现代化旧话语。国家取得发展进步的核心动力应当是自发、自觉、自愿的“序势”，意即符合东方式辩证思维、关系思维、有机思维和内化思维的“有序”和“顺势”。“有序”既包括遵循时间上的先后顺序也包括依照空间上的左右排序，“顺势”既指向符合相对动态的大趋势也指向服从相对静态的大局势。从晚清中国种种变法图强的历史进程看，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普罗大众，大部分中国人并不排斥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前进。那么，中国在鸦片战争后为何屡屡“落后就要挨打”？一方面是“逆势”的原因。清朝在中期就到达了农业文明巅峰，故而便会对工业文明的新兴浪潮视而不见，并且出现了严重的自满傲慢而不肯向西方虚心学习的错误。另一方面则是“失序”的原因，这点很容易被人们忽视。

作为传统东亚天下秩序的中央政权，中国不得不面对近代西方世界以征服整个东方为目标而展开的入侵、掠夺、袭扰、哄骗、欺诈、报复等形形色色、数不胜数的攻击和陷害。欧洲各类国际关系行为体对具有庞大疆域的中国的系统性渗透和多方位侵略使中国防不胜防地面对“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窘境，清朝保守的涉外体制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中国既没有放弃责任政治和伦理政治的理想追求，又不得不在维系天下秩序安稳太平的过程中产生大量额外成本，我们暂且可以将这种中国为了维护保障东亚秩序而产生的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耗损称为“王道的羁绊”。这种疲于奔命的艰难状态势必会占用原本可能的支撑自主现代化进程的资源和时间。

五、结 语

“文明”是东西方共通的概念，本应具有进步性和综合性。东西方世界的

要国际关系行为体大多都有较为丰富和灿烂的历史。对待东西方文明间的交往,应该保持“和而不同”的积极态度和基本原则。这里的“不同”是一种客观事实,每种文明都有自己的独特魅力。文明之间应彼此尊重、平等相待,在充分交流中互相取长补短,用包容的姿态克服傲慢与偏见,用友善的信念避免对立和冲突,才能达到更为和谐、和睦、命运与共的崇高境界。然而,近代以来,“文明”似乎成为了西方国家独占的标识,这主要是因为人们往往将其与全球化和现代化紧密联系在一起。

近代以来的工业革命推动了人类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从而引发了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国际关系的颠覆性革命。但西方世界引领的前三次工业革命却都是与战争或冲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具体反映在工业革命主导者之间,或者在工业革命主导者与既得利益主导者之间,会发生关于旧有国际秩序与新生国际秩序的大碰撞和大洗牌。比如,第二次工业革命主导者德国与第一次工业革命既得利益者英国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导致了极为残酷的两次世界大战;再比如,同为第三次工业革命主导者的美国与苏联之间爆发了旷日持久的冷战。^①但往往被人们忽略的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主导者英国和农业文明的既得利益者中国之间也有过巨大的结构性矛盾,斗争的高潮就是鸦片战争。如今,中国以崭新姿态走近世界舞台中心,和美国共同成为了新一轮数字革命的主导者。如今这个阶段虽然依然被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但其历史意义却是更加类似于工业文明(第一次工业革命)相对于农业文明的跃迁和颠覆。那么,近代东西方国际秩序碰撞的历史会不会重演?战争与和平的世纪难题再次摆在了人们眼前。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和影响力参与到全球治理之中。如果说古代中国留下了极为悠久的丰厚文明基因,而近代中国则是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迟到者”,那么当代中国便是已经积累了充足的实力和智慧来引领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和文化多样化的深入发展。但西方各类国际关系理论并没有给予中国的持续发展与和平崛起以足

^① 高奇琦:《人工智能、四次工业革命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9年第6期,第12~19页。

够、客观和积极的重视,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亟须提供更多新思考来丰富现有的知识体系。

新一轮全球化和现代化不仅是陆海内外联动的,也是网络线上线下互动的。当代的、传统的、实体的地缘政治正在转变为网络地缘政治。数字时代的到来意味着,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使用大国军事实力、势力范围、盟国体系等传统地缘政治概念来预测 21 世纪的大国战略博弈趋势,更要使用“网缘政治”或者“数字地缘”等崭新概念。^① 中国正积极以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球数字增长的重心正由西方世界逐渐扩展到非西方世界。在推动新型全球化和共建数字“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中国始终秉承加强沟通、扩大共识、深化合作的原则,促进网络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合作,不强调意识形态因素、不追求以中国标准垄断数字经济,而是实实在在地帮助相关国家在获得新动能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当然,按照国际反恐和社会治理等需要,中国在数字经济发展进程中,会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手段进行精细化管理,符合国际社会加强全球安全治理的潮流和趋势。

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过程不是推动世界分裂和搞集团对立的过程,中国现在正为各国特别是非西方世界探索崭新的全球化之路和现代化之路提供表率 and 保障。中国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发展自己维护世界和平。这背后既有“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的深刻辩证哲理,^②也包含了古代中国外交“礼和天下”经验中蕴藏的平等意识和互利实践的现代转化。正所谓“不破不立”,人们期待已经实现自我跃迁的当代中国对全球性国际秩序和各地区秩序的发展进步提供更大担当和更多示范,期待在中国的领导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① 黄仁伟:《5G、“一带一路”与“网缘政治”》,《探索与争鸣》2019 年第 9 期,第 47~49 页。

② 毛泽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45 页。